

纪念改革开放暨恢复高考 40 年 院士忆高考 ②9

本报与湖南大学党委宣传部、湖南大学出版社联合推出

两次高考,只为追寻建筑梦想

孟建民

1977年,我第一次参加高考。当收到淮南煤炭学院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虽为自己考上大学而高兴,却没有发自内心的兴奋。因为我清楚地知道,这并非我热爱的专业。于是我下定决心,1978年再战高考。这一次,心仪的南京工学院建筑系终于向我敞开了怀抱。在那里,我一头扎进了建筑的海洋。

一转眼,40年过去。我很幸运,当年恢复高考的政策改变了我的命运。同时也很庆幸,当年坚定地遵从内心的选择,让自己能够与建筑结下一辈子的缘分。

早已埋下学建筑的种子

我1958年出生于江苏徐州。我父母以前都是机关干部,平日鲜有和艺术打交道,但不知为何,我却对绘画产生了浓厚兴趣。打我记事起,大约4岁,父母就对我有“喜欢画画”的评价。此后,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工厂,绘画专长让我肩负起了出黑板报、黑板报的任务。

我自小喜欢画画,又偏爱数学,而这恰巧都是学好建筑设计的基础。人生犹如一部小说,从小的爱好竟然为我日后的高考选择预留了一个伏笔。

还记得我小学上到二三年级时,“文革”就开始了,此后几年,学校和社会都处于一片混乱状态。那时的我们就像一群没人管的野孩子,整天赶鸭子、放羊,到处玩,基本上没学什么东西。

到了1972年,我在上初中,邓小平同志“复出”主持工作,强调教育要走向正轨,我们这才又回到学校,真正学到了知识。

高中时期我就读于徐州一中。当时我的家住在徐州设计院的宿舍,左邻右舍都是建筑师和工程师,从他们身上我开始了解到建筑为何物。有一次去邻居家串门,我无意中翻到了南京工学院校园的画页,随即被那优美的校园环境所吸引。其中最为打动我的是建筑学家杨廷宝先生的建筑水彩画。从那一刻起,我心中便萌发了要学习建筑的想法,南京工学院也成为了我理想中的大学。

可是不料,这个梦才开始做,就破灭了。高中毕业后,按当时的政策,一个家庭如果有两个孩子,其中一个一定要上山下乡,另外一个可以选择留城就业。我们家兄弟仨,哥哥参军后在新疆牺牲了,就剩下我和弟弟。家里顺应了当时的形势政策让我留城就业,由此,我高中毕业后在家待业半年多之后,便进入徐州液压机厂,成为一名学徒工。

那时,无论是在家庭还是社会,读书学习的整体氛围都不强,大家都觉得只要你能正常上学、毕业、找到工作就行了,也没有其他的发展路径和希望。但在工厂工作时,我始终还是怀着一个大学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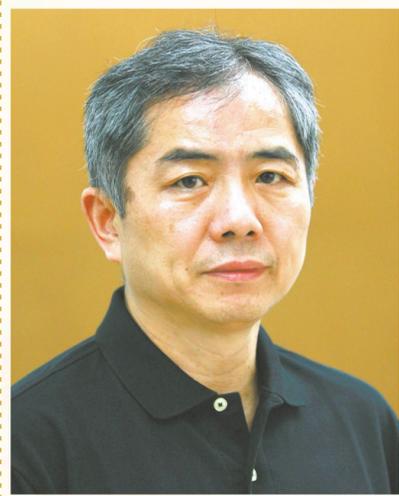
皇天不负有心人,进厂不到2年,便传来了恢复高考的消息。

车间里的“解题大道”

恢复高考的消息是从母亲的单位——徐州面粉厂的大喇叭里传出来的。那时候因为唐山大地震的影响,徐州各个单位都在搭建自己的防震棚,我们一家也搬到了徐州面粉厂。

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出后,整个社会都变得很兴奋,有一种春天来了的感觉,我也立刻决定要去考大学。厂里凡是过去学习有点底子的年轻人,皆跃跃欲试,开始参加一些复习班。那段时间,常听说厂里一些年轻人身体不好请病假,后来才知道他们是请假复习备考。我一贯老实,对这个“套路”全然不知,加班与倒班一样没落下,只能利用闲暇时间复习。

有一个场景至今让我记忆犹新。当年我在厂里是开磨床的,每到休息时间,我就在车间的水泥地上用粉笔解题,数学、物理、化学,什么题都写,尤其喜欢攻克数学难题。所以,车间的地上总是布满了我的解题笔迹,工友们经常在我的“解题大道”上走来走去。



孟建民

1977年、1978年参加高考,1978年考入南京工学院(现为东南大学)建筑系。1990年获该校博士学位。现任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建筑师。主持设计了渡江战役纪念馆、玉树地震遗址纪念馆、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等工程项目200余项,获得各类专业奖项80余项。担任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专项项目“目标和效果导向的绿色建筑设计新方法及其工具”的项目负责人。出版《本原设计》《新医疗建筑创作与实践》等多部论著,总结提出“本原设计”理论,其倡导的“全方位人文关怀”理念和“三全方法论”为工程实践提供了具有可操作性的系统方法与路径。先后被授予“全国建筑设计大师”称号、梁思成建筑奖、光华龙腾奖、中国设计贡献奖、光华龙腾奖、中国设计贡献奖、广东粤百杰人才奖等。201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在我们厂里,我的学习成绩还算是比较突出的,所以会经常辅导工友,帮他们补习。后来我顺利考上了大学,可见老实人有老实人的福气。

我的福气也表现在当时遇到了很多好老师。自从决定参加高考,我就在徐州到处找名师,像我这样主动去找老师的人并不多。当时徐州有一位很有名的数学老师——李嘉俊老师,我登门拜访时没有带烟带酒,只是跟他说明我喜欢数学,我想考大学。可能李老师被我的真诚感动了,就给我一对一补习,布置练习题,带着我一起解题。同时还有一位女老师,一对一地帮我补习英语。另外,还要感谢苏意如、林英和李淑娟等多位老师,他们在我高中求学过程中给予了莫大的帮助,为我的高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那时,我还参加过各种数学、化学、物理的复习班。就这样一边工作,一边复习。1977年冬天,我第一次踏进了高考的考场。

当时所在的考场位于徐州四中,大家成群结伴参加高考,考了两天。每门考试一结束,我们就兴致勃勃地聚在一起对题。第一次高考,我的语文考得很顺利,还记得,当年的作文题目设定为描写自己身边的一个人。我写了当时的一位工友,讲述他积极的工作态度和特点。

那时候刚刚恢复高考,对于考得怎样,大家心里都没底。我当时就想,这次先来试试,不行第二年再考。所以,直到接到淮南煤炭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我才知道自己考得不错,那篇作文还成了当年复习高考的范文。

两次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

接到淮南煤炭学院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为自己考上了大学而高兴,却并没有发自内心的兴奋。我了解到这所学校里没有我向往的专业。这是因为当年高考并没有报志愿的环节,而是直接根据分数来分配学校。

那时候的我一门心思想要学建筑学,于是选择放弃入学,继续复习。当我1978年第二次从高考考场走出来的时候,心里有了底,知道自己这次一定能考上。报志愿的时候,我在第一志愿栏里工工整整地写下了——南京工学院建筑系。

当南京工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寄到厂里后,消息一下子就传开了。那时了解建筑专业的人并不多,一些工友对我的选择十分不解,甚至有人还取笑我考了个“泥瓦匠”专业。现在看来,我很庆幸选择了一条适合自己的专业道路。

终于考上了心仪的学校和专业,我对未来满怀憧憬。我父亲一直比较支持我去考理想的大学,我母亲虽然希望我能留在徐州,但看我这么高兴,也并未阻拦。

南京工学院,即现在的东南大学,是中国现代建筑学学科的发源地之一,大师云集。中国近现代的“建筑四杰”——梁思成、杨廷宝、刘敦桢、童雋,后三位都曾在这里任教。尤其是杨廷宝先生,他是我崇拜的建筑学家,是近现代建筑设计开拓者之一,与梁思成并称“南杨北梁”。

就这样,带着对建筑学的钟爱,对大学校园的向往和对大师的崇拜,我踏上了求学的旅程。当时与我结伴同行的两人,一位是我的初中同学李实,他后来成为了著名的经济学家,另一位是与我一同考入南京工学院的黄醇。我们仨背着铺盖卷和脸盆等日常用品,坐了将近10个小时的火车才抵达南京,那是我第一次为了求学离开故乡徐州。

大校园令我大开眼界

入校后我认识的第一个同学叫邱育章,他是当年福建省的高考状元。我们一前一后走进宿舍,他放下行李后第一件事就是从背包里拿出一把小提琴,当场就给我拉了一段。我当时就被镇住了,心里想:“来读大学的人真厉害!”

让我惊讶的却不止邱育章一人。有一个同学叫何兼,入学时才15岁,是我们宿舍8个人当中年纪最小的,初入学时俨然还是一副孩子的模样。虽说年纪小,却是数学高才生。我高中时数学成绩很好,还是数学课代表,对数学一直很自信。结果面对何兼出的几道数学题我



孟建民在工作中

竟然看都看不懂。大学求学的过程中我慢慢发现,整个校园里文艺、数学、体育、播音等特长的人比比皆是,让我一下子开了眼界。

我入学时,正是“文革”后秩序初复之际,老师们都特别积极,恨不得把自己所有的知识都传授给学生。我们班是由两个小班合并起来的,一共56人,其中50个男生,6个女生。每位老师都是手把手地教学生,较着劲地比着谁教得好,我们也铆足干劲地学习,校园里充满着琅琅的读书声。由于当时教室空间有限,到图书馆和公共教室抢座位,成为校园里一道特殊的风景。

大学期间有一件事情让我印象特别深刻,那是第一次放假回家,我挑了一担子书和学习资料准备假期在家里复习。结果是怎么挑回去的,又怎么挑回来了。后来我才知道,放假时拿几本书就够了,根本没有看那么多书的时间。

进校前我就仰慕杨廷宝先生的大名,进校后又了解了几位名师大家,如刘敦桢先生、童雋先生和李剑晨先生等。本科毕业后,我有幸考取了杨廷宝先生的研究生。杨老先生有一句名言:处处留心皆学问。他无论去哪里都随身携带一把钢卷尺,一个记事本,随时随地丈量记录,这是最好的言传身教。因为建筑与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建筑师一定要善于观察、勤于学习,把握好细节。后来杨先生因病住院,我去陪护。那段时间里,我与先生有了更加深入的交流,向他讨教了很多专业知识和经验,这些教诲让我受益终身。

随后,我师从第二代建筑大师齐康先生,完成了由硕士到博士的学业。齐先生很有战略眼光,他曾说过一句话:“不研究城市的建筑师不是一个完整的建筑师。”强调建筑师的眼光不应局限在建筑单体本身,而应站在城市的宏观角度来考虑建筑问题。这个观点对我后来的学习与职业发展产生了莫大的影响。

为了扩大学生视野,增加实践经验,齐先生经常带着我们外出调研,参加会议,辅助设计创作。在齐先生的带领下,我参与设计了国内多个重要的文化建筑,包括雨花台烈士陵园、南京梅园新村周恩来纪念馆、淮安周恩来纪念馆等,这都为我以后的建筑工作积累了重要经验。

回想40年前参加高考的我们这一代人,都没什么功利心,所展现出来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热爱,是一种激情和热情的释放。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文革”,后来有幸能够步入大学的殿堂,就业时又恰逢国家对人才需求旺盛的社会背景,我们所取得的成绩是基于时代的机遇。虽说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一些困难和艰辛,但心中明确奋斗目标,不轻言放弃,坚持下去,必将得到回报。这也是那个时代在我们性格里留下的烙印。(本报记者朱汉斌、张文静采访整理)

看电影

“我过去会因为我仅仅是一个漫画作家,而其他人在建造桥梁或者是治愈癌症,这让我感到羞愧。然后我逐步发现,娱乐是人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如果你能够给人带来快乐,你就在做一件对的事情。”

这个带给全世界非凡体验的超级英雄斯坦·李于11月13日去世。斯坦·李是美式英雄的代表,他改变了很多人看待英雄的方式。

1961年,他在搭档漫画家杰克·科比的协助下,创作了《神奇四侠》《蜘蛛侠》《钢铁侠》《雷神托尔》《绿巨人》《X战警》《奇异博士》《超胆侠》等不计其数的漫画作品。

后来,这些广为流传的漫画和超级英雄也多被搬上了好莱坞的大屏幕,并传到世界各地。《蜘蛛侠》《X战警》《神奇四侠》《钢铁侠》《美国队长》《雷神托尔》《无敌浩克》《复仇者联盟》《超凡蜘蛛侠》《超能陆战队》,没有一部不是影迷耳熟能详的。

通过这些电影,观众不难发现,斯坦·李赋予了这些超级英雄更多人性化的元素,他并不掩盖英雄们性格上的缺点,为的是让他们成为有血有肉的人物。

斯坦·李的贡献不止于此。

特斯拉和SpaceX创始人马斯克为了纪念斯坦·李,在推文上写下——你为人类创造的想象力和快乐将永存。

斯坦·李带给我们的并不只有动人的英雄故事,以及愉悦的体验,还有他对未来世界的无限构想。那些成就英雄们的酷炫科技,在不远的将来,也许同样能成就我们。

钢铁侠的人工智能管家贾维斯

贾维斯是钢铁侠的智能管家、超智能软件,能独立思考,能帮助主人处理各种事务,计算各种信息,钢铁侠的机甲开发以及方舟反应炉的更新都离不开他的协助。托尼·斯塔克(小罗伯特·唐尼饰)穿上盔甲时,它还会自动进行虹膜扫描,以确保机甲非外人侵入。

钢铁侠的装甲

这是一款使用新型纳米技术的装甲,可防弹、承受爆炸等强大攻击。更重要的是,它可以通过其反重力装置和飞行稳定器来加强飞行,是漫威英雄中使用的最稳定和最快的装甲之一。

美队之盾

一个由原始亚德曼金属制成的圆盘圆盾,具有完美的空气动力学特征。它能以最小的风阻力在空气中运动,并且能保证投掷路线不会偏移。盾牌也有着超强韧性,加上它的自然同心刚度,使其成为完美的投掷物,与实心物体接触只会损失最小的角动量。使用者通过长期训练后,可以将盾牌抛出击穿目标,也可以控制盾牌经过多点反弹后回到使用者手中。

蚁人的皮姆粒子

皮姆粒子是在分离亚原子粒子时发现的,会改变人体质量和身型大小,并能透过此粒子来到微型宇宙,或者其他肉眼看不见的空间。如果长期暴露在皮姆粒子中,身体就会自然生产出皮姆粒子。正是利用了皮姆粒子,蚁人发明一套特别的战斗服,能随意放大缩小。

太空战舰

它是“神盾局(S.H.I.E.L.D.)”组织著名的战舰,最初作为该组织作战指挥部,也是一艘海陆空三栖作战载具。拥有作战指挥中心、监狱、武器库、实验室、医务室等多个分区单元,能持续做亚轨道飞行,能彻底隐身,可以说是一座真正的超级移动堡垒。(朱香)

他给我们留下对未来科技的无限构想



当科研单位成为研学旅游的“供给侧”

本报记者 李芸

“近些年研学旅游发展非常迅速,但面向的群体几乎是中小学生,包括学龄前儿童,很少有面向大学生的。是大学生没有研学旅游的需求吗?2014年日韩的研学旅游(修学旅行)数据显示,大学生研学旅游的比例非常高。我的团队也做过国内西部大学生的调研,结果显示他们研学旅游的意愿非常强烈。”

近日,在国家图书馆主办的海淀区研学旅游专题研讨会上,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王忠君如是说。王忠君对北京市海淀区研学旅游开展经验与“海淀模式”进行了分析,在他看来,海淀区的研学旅游在对接“需求侧”中的大学生群体上,有很大的拓展空间。譬如对拥有创业梦想、对创业有兴趣的大学生,可以开展创业之旅;对有就业指导需求的大学生,可以开展就业课堂、就业环境参观,与HR面对

面、企业实习的就业之旅。

2016年初,北京市海淀区被国家文化和旅游部首批认定为全国研学旅游目的地,拥有非常可观的旅游资源——驻有中央、市属及区属科研单位219个、国家级重点实验室65个、国家技术研究和工程技术中心50个、大中专院校74所、高新技术与创新型企业3万多家。

当旅游从传统旅游走向文化旅游后,旅游目的地就不仅是传统景区,而是博物馆、科研单位等具有教育功能的场所了。

科学国际旅行社是中科院行政管理局所属的国际旅行社,近些年依靠中科院的科研资源开发了多条研学旅游线路,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秦鸣在研讨会上说,其旅行社设计的研学旅游产品,虽然与传统的旅游景点有重合,但更多的是区

别,研学旅游的目的地包括野外台站、科研场所、重点实验室、大科学装置仪器基地等。这些文化、科研单位,用研学旅游的眼光看,就是一个“休眠”且“待开发”的旅游景点。

但同时,文化、科研单位转型为“景点”时也有诸多不适应,国家图书馆副研究员刘雅以国家典籍博物馆为例,分析了文化单位在开展文化旅游方面的优劣势,宏富馆藏背后是馆员接待能力、馆舍开放空间、研学课程开发等等非常细碎的支撑问题。

中国旅游研究院副研究员张扬说,今年暑期她去博物馆调研研学旅游时,听到更多的是作为供给方的博物馆人的困扰,“他们困扰的不是客源太少,而是客源太多,甚至影响了正常的参观秩序”。而从专业角度看,作为研学旅游的博物馆的黏度又不佳,一年之中很少有参观者再次、多次到访。“如

何在有限的空间内持续输出研学旅游景点的服务和产品值得深入思考。”张扬说。

作为供给方和需求方的桥梁,秦鸣认为做研学旅游比传统旅游更辛苦,过去更多的工作是“招生”——找到用户,现在服务需要“前探”,跟供给方的对接,“文化、科研单位,拥有大量的资源,但要真正开发成旅游资源,需要针对用户需求,由旅行社与供给方一同挖掘题材,设计课程”。

在研讨会上,供给方、需求方代表以及旅游专家学者就研学旅游供给侧存在的问题和改革策略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本次研讨会是“文旅·融合·创新——首届海淀区研学旅游季”系列活动的第四项主题活动,也是最后一站。该系列活动旨在整合海淀区研学旅游资源,推介优质研学游服务,推广海淀研学活动品牌。